

# 文化印记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手稿。



青年田汉。

## 《义勇军进行曲》：

# 激励中华民族永远前进！前进！前进！进！

90年前的一天，上海的一个年轻人被房东从出租屋赶了出来，因为他没白没黑地搞音乐，经常被邻居投诉。于是，他借住到了上海电通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家中。这个年轻人，名叫聂耳。在这里，他更加无所顾忌，经常边挥手边拍子边唱词，第一句唱的总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间长了，连司徒慧敏的老母亲“长婆”都听懂了，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啊！”以后，她就叫聂耳为“起来”。

这一天，负责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作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田汉一边吸着烟，一边思考着。突然，伟词壮句涌上心头，近旁却无片纸，他顺手拆开一个香烟盒，就在锡包纸的背面奋笔疾书。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中国人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写完歌词不久，田汉在这年元宵节后第二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继续创作电影剧本的夏衍来找上海电通公司的编导孙师毅，正好遇到聂耳。聂耳开口就问：“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他拿到剧本立马翻到最后一页，找到了那首歌词。聂耳念了两遍，强烈要求：“作曲交给我，我干。”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紧紧握住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接着，聂耳还加了一句：“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聂耳是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聂耳为歌词抒发的救亡情志而激动，创作灵感犹如潮水汹涌，

初稿几乎是一气呵成，两夜工夫就写好了。为了尽善尽美，他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的小亭子间，一遍又一遍地以各种曲调演唱。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弹乐器，一会儿在楼梯上不停走动，日以继夜。结果，遭到房东白俄太太的驱逐。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的一幕。

为了让音乐旋律更为流畅，聂耳找孙师毅商议，将歌词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大炮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后续的修改中，聂耳又将“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中国民族”改为“中华民族”，使田汉笔下偏指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与专指中国境内的“中国民族”合二为一。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退避一体，海内外命运同担。一字一改，意义升华。

清晨，聂耳乘坐电车前往电通公司，车上巧遇电通美工师张云乔。聂耳向他唱了谱曲完成的主题歌，张云乔立即把他带到影片导演许幸之家。那天，许幸之在通宵拍片后刚入梦乡，被聂耳重重的叩门声惊醒。

听了聂耳的试唱，许幸之面前这位年轻人的音乐才华所折服。他提出了自谦为“门外汉”的批评，觉得起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低沉了一些，而结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一番思索后，聂耳当场修改，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复唱一遍，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将原歌词结尾改为三个“前进”的重叠短语，进一步凸显冒着敌人炮火冲锋的勇敢；把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个“进”字，顿显节奏铿锵、煞尾有力，更增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

经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风云儿女》公映，以及歌谱公布、电台广播等，《义勇军进行曲》迅速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等在集会上、游行中都演唱了此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鼓舞士气的战歌。1938年，在台儿庄大捷中，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在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在《人民之战》一书中，爱泼斯坦如此写道。

在缅甸，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军歌，士兵们在训练和作战中高唱此曲以凝聚士气。

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义勇军进行曲》还突破国界，二战期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法老如犹在，惊醒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生唱起这首歌，写下这样的诗句：在美国街头，建筑学家梁思成听到小男孩吹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口哨。许多同盟国的广播电台频繁播放该曲。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甚至将其改编为游击队战歌。

在赴美求学的中国青年刘良模那里，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了这首歌，并于1941年录制了《起来》等中国歌曲的唱片。宋庆龄在唱片封套

上题词：“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写入宪法。

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90年的《义勇军进行曲》，像催征的战鼓，似冲锋的号角，必将继续激励亿万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起来、奋勇前进！

吴海勇/文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 【时讯】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交响音乐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电 6月30日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部分“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和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同首都各界群众800余人现场观看演出。

音乐会通过交响乐及混声合唱、民族器乐演奏等形式演绎了17首音乐作品。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合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管弦乐《人民的胜利》等，紧紧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童声合唱《我们的田野》歌唱田野风光，表达对劳动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管弦乐《千里江山》《清风明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器乐联奏《和美家园》以民族乐器展

现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音乐特色，赞美民族团结和睦；民乐与乐队《焕彩国风》以年轻人喜爱的旋律为基础进行融合改编，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歌剧选段《珊瑚颂》、京剧《圆梦中国人》通过民族化曲调呈现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动人力量；管弦乐《光荣梦想》、交响合唱《新征程》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鼓舞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音乐会由中国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无锡交响乐团等单位联合演出。景焕、袁丁等一批中青年艺术家同台献艺。

### “扇意中国·至扇至美” 当代名家绘扇展在贵州美术馆展出

本报讯 由广东省中国画学会、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扇意中国·至扇至美”当代名家绘扇展正在贵州美术馆展出，展至7月20日。展览荟萃了方楚乔、梁弘健、叶其嘉、罗江、邓健强、王保安、徐恒等近40位省内外知名画家的扇面中国画精品力作，在盈尺扇面上演绎中华传统艺术独特魅力与时代新风。

“扇”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身份象征，而“扇画”则最能折射出中国文人独特的审美经验与哲学精神。此次展览主题为“扇意中国·至扇至美”，分为“扇开万象”和“大美至扇”两大专题，力求将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对客观物

象的精神气质充分展现出来，给观者以心灵的冲击，让其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感受扇画之美、品味画中之魂。

“扇开万象”专题聚焦扇画这一特殊形制的中国画作品，呈现当代中国画家对扇面的艺术实践与深刻理解，关注当代艺术家在全新视野和广域视角下，如何以方寸扇面开启万象之境；他们不仅解读扇画的新内涵与新语境，更在尺幅天地间，观照自然万物，表露心性哲思，抒发诗性情怀。“大美至扇”专题呈现方楚乔、梁弘健、王保安、何婉薇四位当代中国画家扇面上的精彩之笔，深入展示中国扇面艺术自古至今绵延不绝的独特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 【图片新闻】



近日，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和平颂》。以“和平”为主题，音乐会精选四首中俄经典作品，包括俄罗斯民族管弦乐作品《大调民族管弦乐队幻想交响曲》《里亚比主题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以及中国民族管弦乐《黄河》第二乐章“黄河颂”、《和平颂》。这四首作品跨越山河与岁月，一头连着伏尔加河的深沉咏叹，一头系着黄河的磅礴回响。



7月2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瑞士驻华大使馆、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主办的“宇宙考古：时空探索”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把科学探索和艺术诠释融为一体，通过古代文物、沉浸式体验、概念设计等多元作品形态，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构建一次“科学+艺术+历史”的跨界对话。图为观众参观平行时空舱系列装置作品。



连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与周边地区的布依族群众相聚新江畔，载歌载舞，欢度传统节日“六月六”。图为布依族群众在表演《八音坐唱》。

## 【评粹】

### 送别“才子”，在他的故事里找寻“自己”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6月27日，随着蔡澜离世的消息公布，“香港四大才子”均已告别红尘。作为香港流行文化的制造者与引领者之一，蔡澜和另外三位才子相比，更接近于“杂家”，他写专栏、当制片人、做主持人、当美食家、开餐馆，给人的印象是，每件事情都做得成功且精彩。

以内地人的视角看蔡澜，不难发现，他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影响内地的浪潮而被送到读者与观众面前的。蔡澜以言论、观点为内人所关注，再进一步说，他人生几十年所不断输出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态度，最能代表他之于香港流行文化的价值。

“才子”通常与“风流”联系在一起，而蔡澜不仅将“风流”当成自己的名片，还在几乎所有公众能看到的层面，以自己的真实、坦荡、无忌来践行着他“风流”的理解。

从年轻时代到晚年，蔡澜所持有的生活观念与态度是一贯的。他是一位被强大信念推动着走完一生的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蔡澜强调自我与个性，但对于接受他或者欣赏他的人来讲，蔡澜代替许多人过上了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种被向往却难以去实现的生活，他说出了许多人内心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话，做了许多人内心想做但却被现实牢牢桎

梏的事情。对于按部就班生存的人来说，蔡澜近在眼前，又遥不可及。

打量当下年轻人的思想追求与生活目的选择，会觉得蔡澜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导师”的身份，重视自我感受与价值，拒绝被传统中沉重的那部分所绑架，当下许多年轻人的自由姿态，在蔡澜身上都曾发生过。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长的人也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年轻人的想法。或正是因为这个趋势在缓慢地、大范围地形成，蔡澜才处于“一直被理解、很少被批判”的舆论空间中。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而这个样子，也是无数人想要的。

蔡澜显然是享乐主义者，他的

开心与放纵捆绑在一起，他的自由也与反叛捆绑在一起。但在蔡澜身上，也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他的快乐多来自现代主义的熏陶，那么他的痛苦则来自一名传统文人难以摆脱的古典主义背影。他身上有极其矛盾的地方，但他用“享乐”将其消解。他对痛苦、孤独、死亡的理解，符合“红尘繁华尽看透”的既传统又通透的生命观。

才子已逝，对“才子”的固有定义，也早已大变样。送别蔡澜，是告别这位才子的肉身，他作为那一代人的代表之一，所留下的故事，依然会在未来的时光里，被无数人所打量、揣摩，并从中寻找自身所需要。